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宗教风险研究*

王 仓 孟 楠[◎]

内容提要: 作为最早加入世贸组织和最早支持并积极参建“一带一路”的中亚国家, 吉尔吉斯斯坦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地位。本文以分析吉尔吉斯斯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为起点, 在概述宗教发展的历程、现状和现存主要问题的基础上, 对照宗教法治、宗教民族、宗教信仰格局、政教关系、宗教派别矛盾、宗教极端主义、跨国宗教等七个宗教风险评估重要指标, 用大量数据和详实的史料得出吉尔吉斯斯坦宗教风险总体偏高的结论, 因此, 需要进一步深化区域国家宗教安全方面的合作力度和空间, 共同打击“三股势力”, 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共进。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吉尔吉斯斯坦 宗教风险

作者简介: 王仓,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孟楠,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中亚研究院、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

一、吉尔吉斯斯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

吉尔吉斯斯坦(以下简称“吉国”)地处“一带一路”重要区域。吉国原为苏联加盟共和国, 苏联解体后于1991年8月独立。独立次年1月5日与我国正式建交。建交以来, 双边关系健康顺利发展。十八大以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2013年9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吉, 两国元首签署《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标志两国关系实现战略升级, 进入历史发展新阶段。2018年6月, 吉国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与习近平主席共同签署了《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2019年4月, 吉国总统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19年6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吉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前夕在吉国《言论报》等媒体发表《愿中吉友谊之树枝繁叶茂、四季常青》的署名文章。作为最早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 吉国与我国双边贸易基本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和健康发展的势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 两国之间在经贸、投资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我国已成为吉国主要战略合作伙伴国, 是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数据显示, 2012—2018年, 吉国进出口额中我国占比基本呈现持续稳定发展, 从2012年占总额的17.5%、占进口额的22.5%分别增长到30%、39.6%。^①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同吉国“2040年发展战略”进一步对接, 双方合作将继续提质增效。

宗教对社会各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甚至具有潜在的风险。“宗教本身不是风险, 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相互交织, 成为各种矛盾冲突的爆点。”^② 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宗教风险研究”(项目编号16ZDA16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西藏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相互促进关系及创新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8BKS139)的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中国驻吉尔吉斯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 <http://kg.mofcom.gov.cn/>。(阅读时间: 2019年6月11日。)

② 郑筱筠:《“一带一路”战略与宗教风险研究——基于可能性和必要性视角》,《世界宗教研究》, 2016年第6期。

国90%以上居民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部分居民信仰基督教、佛教、犹太教。因此，为确保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以及经济贸易活动的接续展开，就需要了解吉国的宗教风险。

二、吉尔吉斯斯坦的宗教历史与现状

（一）吉尔吉斯斯坦的宗教历史与发展

七八世纪前，中亚地区宗教呈现出多元信仰的局面，除原始宗教外，还汇聚佛教、摩尼教、景教、萨满教、琐罗亚斯德教等。伊斯兰教7世纪创立之后，便开始传播于中亚国家。8世纪时，伊斯兰教开始传入吉尔吉斯斯坦地区，特别是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①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征服中亚时采取各种措施让民众信仰伊斯兰教。随后，经历了近千年的阿拔斯王朝扶持的塔希尔王朝、萨法尔王朝、萨曼王朝、喀喇汗王朝、蒙古汗国，这一时期对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大都持有宽容甚至支持的态度，最终成为伊斯兰世界宗教文化的中心。18世纪中叶，沙俄向中亚扩张，为巩固政权，得到民心，确认伊斯兰教法权威地位、支持穆斯林朝觐。到1914年，全俄共有2.6万多座清真寺，且近半数在中亚地区，这还不包含哈萨克斯坦。^②以至20世纪初，吉国全境基本完成了伊斯兰化过程。^③同时，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大量自主涌入，以及沙俄政府移民计划的实施，东正教在吉国等国开始占有一席之地。据统计，1908年移民高峰时达66.5万人。^④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宣称伊斯兰教的信仰和习惯是穆斯林自由和权利，不可侵犯。^⑤列宁逝世后，苏联政府开展宗教世俗化运动，导致各宗教组织和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卫国战争开始后，宗教政策重新放宽，但到赫鲁晓夫时期又开始实施极“左”政策，全苏开展新一轮反宗教活动。勃列日涅夫时期总体上对宗教还是采取限制措施，但对激进的宗教政策进行了调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其提倡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导致意识形态领域失控，各种思潮泛滥，包括宗教政党在内的非官方组织呈现迅速发展之势。由于伊斯兰教传播中亚达上千年，已根植于信教群众心中，并基于自身顽强生命力的属性，因此，伊斯兰教在吉国迅速恢复、发展、复兴起来，成为主体宗教，以至后期形成“复兴运动”，这为20世纪90年中后期开始盛行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埋下巨大隐患。

（二）吉尔吉斯斯坦的宗教现状

吉国主要宗教有伊斯兰教、基督宗教、佛教、犹太教、巴哈伊教等。伊斯兰教以逊尼派为主，基督宗教以东正教为主。独立后，吉国宗教政策宽容，各宗教团体、组织、人数、清真寺/教堂不断发展变化着，但总体趋势是伊斯兰教发展迅猛。独立20周年时，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数占总人口的75%，信仰俄罗斯东正教7%。正式注册登记宗教组织2200个，此外，还有若干外国的宗教组织或其分支机构在吉境内秘密或以社会团体的形式活动。^⑥到2017年时，信仰伊斯兰教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高达90%，其中逊尼派占99%以上、什

① 许涛：《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宗教概况》，《国际资料信息》，2002年第8期。

② 赵常庆：《中国五国概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9页。

③ Mohiaddin Mesbahi: *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After the Soviet Un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1994, p.159.

④ [英]加文·汉布里：《中亚史纲要》，吴玉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0页。

⑤ [苏]苏科院历史所：《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册）》，赵常庆等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

⑥ 张宁：《吉尔吉斯斯坦的宗教管理体制》，《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叶派不到1%。信仰基督宗教人数占总人口7%，其中43%是俄罗斯东正教。犹太教、佛教、巴哈伊教以及不信教人口约占3%。随着信教人数的增加，各种基础设施、学校以及社区等建设也新增不少，现有清真寺近2600座，宗教学校89所，穆斯林基金等74个、俄罗斯东正教堂51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教堂31座，^①并在国家宗教事务委员会（SCRA）登记注册伊斯兰教组织2827个、基督教组织386个、佛教组织1个、犹太教组织1个、其他宗教社团12个。

（三）吉尔吉斯斯坦宗教发展趋势和主要问题

吉国宗教发展最大的趋势是信仰伊斯兰教人数和所占人口比例大幅增长，同时促进了清真寺、伊斯兰教组织社团或学校增加；基督宗教以及其他宗教信仰人数及所占人口比例大幅下跌。主要原因有宗教信仰人口民族结构的变化、独立初政府主体民族优先发展思想及开放的宗教政策、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以及周边国家对其开展的宗教活动等。以人口民族变化为例，主要信仰伊斯兰教的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东干等民族人口数由1979年^②的401万（总人口410万）增加到2019年底的590万（总人口638.9万）；而主要信仰基督宗教特别是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由65.3万减少至34.8万，信仰佛教的朝鲜族人数由2万减少至1.7万；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口下降超25%。^③宗教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兴起的宗教极端思想的持续渗透与传播并由此引发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给本国和周边国家带来巨大威胁，导致宗教风险发生概率较高。

三、吉尔吉斯斯坦宗教风险分析

（一）宗教法治的风险

法治政策、法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宗教风险发生的概率。宗教法律制度、法治理念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这种不确定性导致政府机构对宗教管制的宽严程度不同，宗教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亦不同。同时，宗教法治、政策自身所具有的滞后性决定了其在实施和有效度上存在宗教风险的可能。因此，对宗教法治风险的分析主要考虑该国宗教管理的主要问题。^④面对复杂的宗教状况和突出的宗教问题，吉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宗教政策。

吉国的宗教政策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相对宽松的宗教结社、信仰、传播时期，起始标志是独立后当年12月出台的《宗教自由和宗教组织法》。该法确认了宗教组织的多元化，允许公民基于自愿而成立宗教组织，指出每个公民都有权“自由和独立地确定对宗教的态度……并表达和传播与宗教态度有关的信仰”。^⑤这一宗教政策得到了1993年独立后第一部《宪法》的确认。为全面贯彻宪法精神，1996年总统发布了《关于落实吉尔吉斯共和国公民信仰和信教自由权利措施》的命令，正式宣扬对宗教宽容、保护信仰自由。宽松的宗教政策促进了宗教复兴。第二阶段则是在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基础上，规范宗教组织活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Kyrgyz Republic(2016–2017), <https://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 (阅读时间：2019年6月11日。)

② 苏联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是1989年，但这次普查仅公布了地区人口总数，并没有各加盟国民族人口数字，因此，本文以1979年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参照。

③ 参见路曼：《关于苏联民族情况的统计资料》，《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0年第1期；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kg/en/statistics/naselenie/. (阅读时间：2019年6月11日。)

④ 杨莉：《“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哈萨克斯坦宗教风险研究》，《世界宗教文化》，2017年第2期。

⑤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 Kyrgyzstan.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the Post-Soviet Era,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3ae6a60910.html>. (阅读时间：2019年6月11日。)

动,对宗教组织的管理、登记相对严格,严厉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20世纪末,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盛行,吉国于1999年出台《反恐怖主义法》、2005年颁发《反极端主义活动法》、2009年实施新的《宗教表达自由和宗教组织法》并出台《国家安全构想》、2014年通过《国家宗教政策构想》(2014—2020)、2016年总统签署《就反恐和反极端主义相关措施针对吉尔吉斯共和国部分法律进行补充修改法案》。

总体而言,第一阶段宗教政策向第二段转变实施已多年,但宗教极端思想、恐怖主义仍严重影响着吉国社会稳定。这主要是因为周边伊斯兰国家对吉国深入开展传教活动,特别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中东国家通过资金支持、派遣人员、修建清真寺等方式支持传教,从而达到扩大伊斯兰教影响的目的。同时,为了打击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吉国通过强有力的宗教政策和法律对宗教活动实施“一刀切”的做法引起众多宗教组织和穆斯林的不满,从而致使宗教政策、法律的顺利实施受阻。因此,需要正视这一风险的存在。

(二) 宗教民族的风险

中亚是种族、民族和部落迁徙和聚合的走廊,也是多种文明和文化交汇的地区,因此民族宗教因素始终是影响中亚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①民族与宗教的是双向互动的,即当民族关系和谐时,宗教倾向于朝着一个更温和、更宽容的方向发展,宗教风险低;当民族关系不好,甚至紧张时,宗教将朝着激进主义和排斥主义的方向发展,宗教风险高。宗教风险的发生与民族数量和分布、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有关。当民族数量较多且每个民族对应一种宗教时,宗教风险相对较高。民族政策不合理,宗教风险高。民族关系融洽,宗教风险低。

吉国是多民族国家,多种宗教并存。民族构成上,吉国有80多个民族,其中吉尔吉斯族占73.5%,乌兹别克族占14.7%,俄罗斯族占5.5%,东干族占1.1%,其他为维吾尔、塔吉克、土耳其等民族。^②宗教信仰上,信仰伊斯兰教除了主体民族吉尔吉斯外,还有乌兹别克、哈萨克、鞑靼、维吾尔、东干等民族。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民族信仰东正教。德意志人信仰基督新教,属路德教派。犹太人信仰犹太教。朝鲜人信仰佛教。各民族宗教信仰上的差异,不仅会导致文明冲突,亦会对国家战略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例如,吉国费尔干纳盆地、阿赖山下的南方人与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关系密切,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主张与穆斯林国家发展关系,并使国家伊斯兰化。楚河谷地、伊塞克湖塔拉斯的北方人则与南西伯利亚民族相接近,主张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维系密切联系,从而保持国家的世俗化。

吉国的民族政策如同宗教政策一般,也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主体民族优先发展”为执政理念,制定向主体民族倾斜的政策。该政策造成主体民族与俄罗斯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非常显著,在干部配置、任用方面明显偏重于主体民族。例如,1995年2月新议会前两轮选出的78名议员俄罗斯族只占6%(俄罗斯族人口占全国人口20.9%)、吉尔吉斯族占近90%(吉尔吉斯族占全国总人口52.4%)^③。同时,由于宪法确认了吉尔吉斯语的国语地位,使得较为通行的俄语被边缘化,造成俄罗斯族等通晓俄语民族子女求学、就业求职、职位晋升等困难重重,很多俄罗斯人离开吉国。据统计,在“去俄罗斯化”政策打击下,吉国近40万的俄罗斯人和操俄语的居民迁移俄罗斯。^④第二阶段以2000年出台《官方语言法》确定

① 陈联璧、刘庚岑、吴宏伟:《中亚民族和宗教问题》,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4页。

② 2009-2019-ж. туруктуу калкынын айрым улуттар боюнча саны, <http://www.stat.kg/en/statistics/naselenie/>. (阅读时间:2019年6月3日)

③ 赵常庆:《中亚五国概论》,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164页。

④ 雷琳、王林兵:《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动态移民潮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俄语为官方语言为标志，制定、执行民族和睦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吉俄民族矛盾。同年，南部奥什城建城 3000 年，吉国举办了盛大的全民族庆祝活动，总统作出决定将奥什市作为第二首都，缓和了南部吉乌民族矛盾，促进了民族团结。2011 年 6 月，吉国召开国民大会提出“吉尔吉斯斯坦——我的祖国”民族团结政治理念，强调全国各族人民都需树立国家认同思想，平等对待所有民族的象征、传统和习俗。^① 2010、2016 年通过的宪法，进一步确定每个民族享有保留母语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因种族、民族等的差别而受到歧视。

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关系不够融洽，甚至具有突出的矛盾。吉国在沙俄、苏联时期民族关系复杂，民族矛盾尖锐。独立后，吉国南部吉尔吉斯族与乌兹别克族基于历史上的民族恩怨、苏联民族政策的影响、南北经济的差异以及独立后政权结构不均等因素，仍存在严重的民族冲突，其中最为激烈的当属 2010 年的“六月事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害。据调查，截止 2010 年 12 月 10 日，发现 426 具尸体中能确认身份的 381 人中有乌兹别克族 276 人、吉尔吉斯族 105 人；1930 名受伤人员，财产损失达 37.6 亿索姆。^② 此次民族冲突进一步加重吉乌民族之间的隔阂，以至事件发生四周年时，奥什州民族主义分子再次起事，通过设置路障、切段交通的方式向政府示威，要求释放之前的政治犯。^③

（三）宗教信仰格局的风险

信仰格局与宗教风险之间关系紧密。信仰格局可以分为信仰宗教类型格局和地域格局。一般来说，信仰类型格局因不同宗教具有不同理念价值，且受政治、文化以及传播方式等影响，信仰人群及数量则不同。地域格局受历史传统文化、地缘政治等影响。宗教信仰格局不平衡，给吉国以及周边国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

目前，伊斯兰教在吉国仍占据宗教主导地位，且信仰人数及占有比例不断增长，报告显示，2011—2017，信仰伊斯兰教人数由 2011 年占比人口总数的 75% 增长到 2017 年的 90%，而俄罗斯东正教则由 7% 下降至 3%，其他教派及少数无宗教信仰人士由 18% 下降至 7%。^④ 截止 2019 年底，在 SCRA 注册的伊斯兰教组织有 2827 个，其中逊尼派有 2825 个，还有 2 个外国教派使团；从区域范围来看，南部地区奥什州、贾拉拉巴德州、巴特肯州三州伊斯兰组织有 2027 个，占比达 72%。^⑤ 同时，独立以来新增清真寺 2500 座，是 1990 年苏联解体时 39 座的 64 倍。^⑥

吉国第二大宗教是基督教，信仰人口占全国总人口 7%，注册登记的基督教组织有 386 个。^⑦ 从数量上来看，前五大流派分别是五旬节派、浸礼会、东正教徒、魅力派、耶和華见证人，共有 259 个，占 67%。从区域分布上来看，主要以北部地区为主，楚河州、比什凯克

① Ассамблея народа кыргызстана: двадцать мгновений истории, <http://slovo.kg/?p=29263>. (阅读时间: 2019 年 6 月 6 日)

② Кыргызстан: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заключ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ю июньских событий, <https://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871&print=1>. (阅读时间: 2019 年 6 月 5 日。)

③ 孙力、吴宏伟:《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57页。

④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Kyrgyz Republic (2011–2017), <https://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 (阅读时间: 2019 年 6 月 5 日。)

⑤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делам религии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http://religion.gov.kg/ru>. (2019 年 6 月 6 日。)

⑥ 《吉尔吉斯斯坦 28 年间修建了 2500 座清真寺》,伊朗国际古兰经通讯社, <http://www.iqna.ir/zh/news/2616655/>. (阅读时间: 2019 年 6 月 6 日。)

⑦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делам религии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Зарегистрированные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http://religion.gov.kg/ru>. (2019 年 6 月 7 日。)

市、伊塞克湖州，占85%。同时，还有其他已登记宗教社团12个，以及佛教组织1个、犹太人组织1个。另有21个组织，如“基地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伊斯兰解放党”等，因具有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倾向而被列为“黑名单”，禁止开展活动。

总体上看，伊斯兰教在吉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坚实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宗教政策的保护，并受“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穆斯林人口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已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基督宗教以及其他宗教地位、信仰人口大不如前，甚至很多民众已改变原有宗教信仰，而选择伊斯兰教。从全国格局上看，伊斯兰教最为集中的地方是南方城市和农村，而俄罗斯东正教基本在北方城市。因此，南部地区伊斯兰极端组织活动比较活跃，“乌伊运”残余力量、“伊斯兰解放党”等宗教极端组织经常制造事端，暴恐事件易发、多发。因此，虽然吉国是伊斯兰教独大的多宗教国家，但随着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其宗教风险比较大，特别是南部地区，需引起我们格外注意。

（四）政教关系的风险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作为考量宗教风险的重要指标，但仅以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来谈宗教风险的高低则显然不合理。政教合一可以引起高风险亦可抑制宗教风险的发生，政教分离，反之亦是。“设立国教不是宗教风险的根本性评价”。^①为此，需要全面观测政教关系动态，以做出正确的宗教风险判断。

吉国自独立以来，以建立民主、法治的世俗社会为目标，始终实行政教分离体制。独立当年颁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一方面明确国家不干预宗教组织的合法活动，另一方面强调不允许宗教建立政党或分支。这一基本原则在独立后历次宪法制定或修订中得到延续。现行《宪法》直接在第1条指出，“吉尔吉斯共和国是实行单一制、主权的、民主的、法治的、世俗的和社会的国家”。^②民主改革进程中，以缩小总统权、扩大议会权、实行多党执政联盟为目标动力。2010年前实行总统制，2010年宪法重新制定并开始实行议会制，目前是中亚国家唯一实行议会制国家，一度被誉为“中亚民主岛”。

然而，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高涨，以伊斯兰复兴党、解放党为代表的持原教旨主义的宗教组织公开登上中亚政治舞台，与中亚的世俗政治制度相抗衡，并力图改变国家的世俗化方向。伊斯兰政治化倾向对吉国政局产生较大影响，特别是南部地区。前总统阿卡耶夫大力支持国内的宗教复兴，由此导致90年代各种骚乱、流血事件的发生，以至自己也被迫下台。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各国合作打击以建立“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推翻现行世俗政治原教旨主义，吉国也将各种反世俗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宗教组织列入“黑名单”，这才迎来现有较为稳定的政治局面。但对受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影响较深的吉国而言，“推行全方位的世俗化民主改造注定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③我国紧挨吉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吉国政教动荡不稳引起的宗教风险应引起高度重视。

（五）宗教派别矛盾的风险

宗教教派矛盾与冲突直接影响宗教风险发生的概率，因此，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不同派别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宗教风险的考虑指标。一般而言，不同宗教间基于教义理念的根本性差异，宗教风险易发生。同一宗教基于本源上的同一性，宗教风险较难发生，但不能完全排除风险。考量吉国宗教教派，总体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较为激烈，需

① 杨莉：《宗教风险评估指标维度初探》，《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2期。

② 世界各国宪法编辑委员会：《世界各国宪法（亚洲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年版，第246页。

③ 雷琳、郎正文：《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要引起关注。

吉国作为多宗教的世俗国家，全国总人口90%以上信仰伊斯兰教，且99%以上是逊尼派，不到1%是什叶派。国民如此集中信仰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很难发生与什叶派争夺穆罕默德正宗继承人身份的冲突，实践中也少有矛盾事件的发生。因此，伊斯兰教不同派别的宗教风险几乎没有。作为第二大宗教的基督宗教流派众多，总体上信仰人口仅是全国人口的7%，近一半信仰俄罗斯东正教。如上所述，东正教的传入并占据吉国基督宗教主导地位离不开沙俄、苏联的影响。独立后的吉国，由于宗教政策较其他中亚国家更加开放，东正教组织也多了起来，但以美国为主推动的其他基督宗教教派也在吉国传播开来。基于美俄之间的政治关系，宗教往往受其影响，导致基督宗教内部派别冲突时有发生，特别是随着俄罗斯族迁回本国，东正教影响力逐年下降，其他流派作为一股新的宗教力量与东正教的主导地位就产生了基督宗教内部派别斗争风险，因此，留存的东正教与伊斯兰教联手，一致反对其他基督宗教流派。

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之间的冲突则是吉国最大的宗教风险。吉国自8世纪始就开始信仰伊斯兰教，而基督宗教的传入则是19世纪的事，因此，基督宗教传入之时就引起穆斯林的反对和政府的担忧。虽然独立后宗教政策开明，但伊斯兰教与基督宗教的斗争却并未彻底解决，有证据表明，保守的穆斯林和外国基督宗教传教士，以及由伊斯兰教改信其他宗教的个人存在周期性的紧张关系，且伊斯兰教和俄罗斯东正教精神领袖都批评非传统基督宗教团体的布道活动。^①2009年随着新宗教法的实施，宗教管理措施的加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伊斯兰教和基督宗教之间宗教风险。其他宗教无论是人数还是所占人口比例都非常低，很难对第一、二大宗教产生威胁，且教义温和，如佛教的“以慈悲为怀”，与其他宗教间关系较为融洽。

（六）宗教极端主义的风险

宗教极端主义与宗教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二者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宗教极端主义者在宣教布道时，假借宗教的名义，对宗教进行错误、极端的阐释，并怂恿信仰者开展暴力恐怖、分裂国家、推翻现有世俗国家政权活动。宗教极端主义给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带来巨大挑战，因此，作为宗教风险的重要考量指标。独立以来，吉国受宗教极端势力的影响，给本国、“一带一路”国家以及国际秩序带来巨大全球威胁，不得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独立之初，吉国实行开放的宗教政策，致使伊斯兰教全面复兴，信教人数和比例极大提升，而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危机。危机的根源是宗教气氛和宗教意识的不断增强，原教旨主义兴起，“以教干政、以教压政、以教代政”的现象日益突出，宗教由此走向宗教政治化、宗教异化的道路。20世纪90年代末起，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在吉国表现得极为活跃，各类暴恐事件频发，国内安全风险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宗教极端势力先后制造“巴特肯人质事件”、武装袭击政府案、中国领事和公民枪杀案、奥什市爆炸案、伊扎布特煽动案等。近些年宗教极端势力更是日益猖獗，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据统计，2015—2017年，发生极端主义事件1398起，涉及刑事案件533件，判刑、逮捕1013人。^②“9·11”事件后，吉国出台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大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打击。同时，与中

①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2009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 Kyrgyz Republic, <https://www.refworld.org/docid/4ae8612c91.html>. (阅读时间：2019年6月11日。)

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2015–2017)– Kyrgyz Republic, <https://www.refworld.org/cgi-bin/texis/vtx/rwmain>. (阅读时间：2019年6月11日。)

亚其他国家以及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国开展反恐活动、军事演习合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极端势力的发展、极端事件的发生、极端思想的蔓延。然而，极端势力仍以各种方式对我国新疆地区进行渗透、入侵，宣传煽动并发展组织成员挑起民族矛盾，深刻影响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的实现。

（七）跨国宗教的风险

宗教作为一种组织，其发展已经不再受国界的约束，而正逐渐变得全球化，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宗教的跨国别。诸如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等通过国际传教活动，不断干涉他国包括人权在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既有秩序，甚至实施恐怖活动，给国家主权和安全带来严重挑战。^①因此，宗教风险的发生不仅受国内各因素的影响，亦受跨国别的挑战。总的说来，跨国别宗教风险由跨国之间的民族类别、信仰宗教类型以及宗教自身属性决定。渗透力强、影响力大、易被异化的宗教，加上跨境民族种类、数量多往往导致宗教风险的发生。

吉国作为与我国相邻的多民族国家，其国内民族中有九个与我国民族具有同源性，其中大多为新疆13个世居民族类别。基于同源性，吉中跨界民族在历史、宗教、文化、语言、习俗上则非常相似，甚至一致，最为凸显的就是国民主要信仰的伊斯兰教也是我国新疆地区的主要宗教。因此，吉国的民族宗教冲突、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严重影响到我国，特别是新疆的安全稳定。因此，吉中跨国民族、宗教的交往势必造成地缘政治的不稳定，引发宗教风险的发生，影响到国家的安全稳定团结，需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四、结论

吉国作为中国的传统友好伙伴，建交以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合作密切，是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建设的国家之一。作为以吉尔吉斯族为主体民族、以伊斯兰教为主体宗教的一体多元国家，吉国宗教风险的发生将深刻影响到我国的和平、安全和稳定。探究吉国宗教风险评估的宗教法治、宗教民族、宗教信仰格局、政教关系、宗教派别矛盾、跨国宗教等七个重要指标，可以发现，其宗教风险发生的高几率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能完全避免，为此，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并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深化宗教安全方面的合作力度和空间，共同打击以宗教极端思想为本源的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实现共享互赢，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共进。

（责任编辑 王伟）

^① Jonathan Fox、Shmuel Sandler: *Bringing Religion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83.